

# 中国考古学的觉醒与理论革命

## ——关于考古学走向成熟的若干思考

卜 工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075)

内容提要: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于“三个转变”,即:在考古学基本理论方面,存在着从简单地层学向考古层位学转变的过程;在研究方面存在着从长于描述向深度研究转变的例证;在学科的作用方面存在着从“补经证史”向谱写历史篇章转变的客观事实。

关键词:简单地层学 考古层位学 单纯描述 深度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自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破土发掘到现在,以走上田野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90华诞。作为新兴的学科落户在中国这样古老的土地上,从一开始就必然受到传统史学无微不至的关照,也深深地被地质学的方法制约,其他学科的先进理念与经验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可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大量鲜活的考古资料不断地浮现出传统史学难以解答的问题;考古发掘中层出不穷的复杂现象令借来的概念捉襟见肘,简单的“地层”已经不能真实涵概和准确表述中国古代文化堆积的特点,特别是遗迹之间环环相扣的复杂关系,虽然不曾见诸中外文献的记录,但总是能令人品味出中国黄土特有的醇香;其他学科的经验不时地启发着年轻的中国考古学独立自主的学科意识,摆脱简单借鉴与单纯模仿,创造学术新天地的渴望与要求不断高涨,甚至达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于是,实践酝酿的理论革命便在探索与追求的过程中悄然萌动与发生了。经过几代考古前辈的积极倡导、亲自引领和努力推进下,学科觉悟的火花终于形成燎原之势,创新性的理论革命大大提升了考古学的地位,甚至改变了历史研究领域的格局。在中国早期历史研究中,考古学可以说“NO”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就是铁证。本文试图通过“三个转变”的分析探索中国考古学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

### 一 从简单地层学向层位学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国考古学走上田野是近代由外国人引入的。其标志是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此举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头等大事,安氏因之名扬海内<sup>[1]</sup>。他引进的田野发掘方法和技术含量是人们不能忘记的。在发掘工具、地形地貌的测量、使用探沟形式的发掘方法、遗物的记录与提取、对地层的重视等方面,都显示出他的高明与独到之处。但是,安氏也有其学术背景的局限性。这就是用地质学对地层的认识按深度计算,而不是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认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堆积层次。在仰韶村遗址的第二探沟,安氏从地表到地下约320厘米处分了六层:第一层是地表至70厘米处,第二层是70~150厘米处,第三层是150~200厘米处,第四层是200~240厘米处,第五层是240~270厘米处,第六层是270~320厘米处。由于按深度划分堆积层次和收集记录遗物,所以就难免将不同时期的遗物搞混搞乱,而视为同一时期<sup>[2]</sup>。

然而,安特生毕竟带来了考古学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念,揭开了用考古学的手段认识中国古代遗存的帷幕,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学者走上田野的热情。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便可作如是观。他采用的象限法布设探方,实开中国考古发掘之先河,时至今日此法仍然在使用。

然而,李济依旧采用以深度计算的水平发掘方法则没有明显进步。据研究,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河南安阳后岗的发掘应该是“依自然层进行的”,在241、243、244坑的上部除了20厘米厚的耕土,又分三层:上层灰土、中层灰褐土、下层深灰土,诸坑的遗物是以三种文化层统计的。此三层即著名的“三叠层”,上层为殷墟文化,中层为龙山文化,下层为仰韶文化,这一重要的发现被认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钥匙”。至此,田野考古发掘的方法初具规模,中国考古学的体系建设才提到日程上来,地层学的概念也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普及。此后数十年间,按“三叠层”原理进行的考古发掘在中国始终处于主流地位,地层学如何长短成为考古工作者的口头禅。但是,多年的实践,并没有促成这种方法向更高层次进步,许多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反而躺在“三叠层”原理上睡觉,固步自封、缺少追求。面对种类繁多的遗迹及其纷纭复杂的相互关系,依旧只能用“地层”概括,显示出早年从地质学借来的概念在内涵方面的苍白空洞,与中国古代文化堆积的实际情况貌合神离、相去甚远,在推进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更有甚者,是将地层的意义与重要性推至具有排它性的绝对化程度,演绎出“没有地层就不能对遗址进行分期”的错误命题,奇怪的是,原本完全错误的东西竟然一度成为至理名言和金科玉律,其结果只能是阻碍学科的正常发展。

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这种命题的局限性:其一,是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sup>[3]</sup>。1953年初至1954年发掘,资料见于《郑州二里岗》。其二,是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sup>[4]</sup>。1956、1957年度发掘,《庙底沟与三里桥》报告了该遗址的资料。不能否认,这两部考古学专刊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报告编写的体例、绘图、统计和技术环节近乎完美。但是,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分析,依然能够从中发现若干时代局限性的烙印,那就是只重视文化层,而忽视遗迹现象及其打破关系在遗址分期中的意义。《郑州二里岗》在叙述文化堆积时说:“就以上商代文化层次堆积关系看,2层压在3层之上。就两层出土的陶鬲、大口尊、罍、豆、盆和卜骨等器的区别来看,第2层和第3层显为两个不同时期的堆积。3层早于2层的形成。因之,2层我们称为二里岗上层,3层我们称为二里岗下层。”这是该遗址商代遗存分期的主要依据,但表述并不正确。因为,这里商代遗存由早到晚堆积的顺序是:压在第3层下的灰坑,然后才是第3层,再后来是压在第2层下打破第3层的灰坑,然后才是第2层,最后是打破第2层

的灰坑。也就是说,该遗址的商代堆积过程存在5个阶段,而不是2个阶段。在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认识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与性质,郑州二里岗遗址的经验与认识显示出特殊的指导意义,因而也掩盖了它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对遗迹现象的意义完全估计不足,甚至是达到了熟视无睹的境地。随着对商文化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早商与先商文化研究课题的提出,势必要重新审视该遗址的发掘经验与认识,邹衡先生关于《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分期研究》因此应运而生,他运用层位学的原理透析了该遗址商代遗存的堆积顺序,重建了新的年代分期标尺,为探索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认识都记录在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论文集》中,于此不赘。

庙底沟遗址的报告者则这样描述六个区的文化堆积:T1区“主要是战国层压在仰韶文化层的上面”;T100区的“堆积,除了仰韶文化层外,在东边还发现有两个龙山灰坑(H27、H35)打破了仰韶灰坑的现象”;T300区的堆积“除了北边有一小部分很薄的汉代层和一条南北贯穿的汉代灰沟外,都属于仰韶文化层”;T400区“自耕土以下系属于仰韶文化的堆积”;T500区“主要是龙山文化的,但也有发现龙山文化压在仰韶文化层的上面”。因此,报告者只提出了该遗址文化与年代的两期说,即庙底沟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前者属于仰韶时期,而对后者报告者认为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性质。而现在看来,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有庙底沟文化、仰韶晚期、龙山早期三个阶段的文化遗存<sup>[5]</sup>,由于仰韶晚期遗存没有文化层的堆积,只有灰坑的现象,在只重视和强调地层的日子,遗迹作为具有独立年代意义的单位被彻底忽视,它们之间的打破关系是遗址分期的重要线索的认识根本无人提及,因此,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就这样被完全淹没在庙底沟遗址的茫茫材料之中。可见,单纯依靠“三叠层”的原理已经很难认识和解释田野考古发掘中的诸多复杂现象。以往流行的关于遗址分期的相关理念也有失偏颇。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寻找方向,平凡的发现也可能孕育出新的思想。1951年苏秉琦先生在陕西西安斗门镇以西的开瑞庄村北,清理了灰坑7、灰坑8和M2<sup>[6]</sup>。按他的表述:灰坑7原来为一锅底形的灰坑,大部分已被灰坑8打掉;灰坑8原为平底圆形覆杯状的地下窖穴,西南一大半先被M2打破;M2为东西向的竖穴,穿过灰坑8,在生土下面,其西部亦被近年取土切去,幸因墓坑底层深在坡下耕地

的下面,保存完整;M2的竖穴坑口以上,现在的耕地以下,是成层的灰土。这样,就形成了以灰坑7、灰坑8、M2及其上层为代表的四个时期连续堆积的断面。由此,苏先生提出文化一、文化二、文化三的概念,指出“这一地区确实存在着三种面貌不同的文化遗存;三者的相对年代关系是文化一早于文化二,文化二早于文化三”。然而,这一发现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其重要性在于方法上完全突破了“地层”的束缚,提出了根据遗迹的打破关系进行遗址分期和文化分期的证据,改变了地层学对文化堆积的简单表述,显示出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悄然的觉醒。在“地层”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环境中,能够大胆地提出反传统的新认识,委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此后,精彩的个案研究依然不断出现,深深地吸引着学术界的关注。1964年,邹衡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发表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中,明确提出了遗迹单位和层位关系的概念,淋漓尽致地阐发了层位学思想,精彩绝伦地演绎出他研究论证的基础,充分展示出层位学的理论意义及其优势。他强调:“在同一基址下或被破坏的单位必然早于基址本身及其所包含的其他单位(主要是葬坑);在同一基址上或破坏基址的单位必然晚于基址本身及其所包含的其他单位。这样,一个基址及其有关单位,一般的至少可以分为三层,即:基下单位→基址本身(及其所包含的葬坑)→基上单位。”由此提出了层位学关于遗址文化堆积的正确表述方法,将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实,邹衡先生也是从地层学的营垒中杀将出来的,如果回顾历史,则不难发现他曾经也笃信简单的地层学。《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说明,当时邹衡先生的思想高度尚未达到层位学的境界,所以,地层、地层叠压关系等人们习见的地层学概念在文章中随处可见。但是,到了1964年,邹衡先生已然放弃了地层学的概念,使用了全新的概念及其表述方法,彻底地完成了向层位学的转变,升华了对中国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认识与理解,其思想的光芒力透纸背,扑面而来。可见,中国考古学在觉醒,独立潮头的学者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借鉴与拿来,在许多个案的研究中用实际行动表达研究的取向,挑战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简单借鉴与模仿,并开创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新天地。

1982年《文物》第4期发表了苏秉琦、殷玮璋《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的文章,明确地提出:“考古学上称为地层学或层位学的,指的就是地层堆

积的层位上下,堆积时代的相对迟早关系的研究。”次年,张忠培先生在《文物》第5期《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也强调了“探讨这些堆积的时间与空间,或纵与横的关系,就是地层学或层位学”。两篇文章都在赋予地层学以全新内容的同时,提出了层位学的概念,表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升华和转变,向着注重传承、注重特色、注重国情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为学科的新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层位学的基本内容是研究文化堆积的过程与关系。尤其强调遗迹单位年代上的独立性,认为遗迹与文化层的堆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两者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开口在同一文化层下的遗迹年代可能相同,也可能完全不同;而遗迹本身又存在建筑、使用与废弃3个年代;按照“三叠层”的原理考察文化堆积,关注的是其纵向的关系,按层位学原理考察文化堆积则要求从纵横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入手解读文化堆积的成因。开口在同一层下具有打破关系的遗迹,形状完整者晚,不完整的即被打破的早;清理时要先做晚的后做早的,按单位收集出土物;并认为遗迹单位共生关系的质量往往高于文化层的堆积。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和提炼的认识与考古学初创时期借用的概念实有天壤之别,虽然地层的概念本身可以改造并赋予新的内涵,但不论怎样的洗心革面和脱胎换骨都不如层位学概念来得准确、明了和具有中国特色。这里并非要全盘否定地层学的历史功绩,而是强调用新的概念表达中国考古学的方法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可见,以走上田野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1、1921~1930年,是发掘方法的摸索期。主要是将地质学的发掘方法移植到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掘手段与理论的阶段。

2、1931~1982年,是地层学理论与方法的形成期。此时的地层学是以“三叠层”原理为基本内容,注重的对象是文化层的堆积,对遗迹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尚不充分和全面,在表述方面也存有欠缺。

3、从1982年至今,是地层学向层位学的转变期。中国特色的田野考古发掘普遍受到高度重视,重视遗迹现象,研究堆积关系及其形成原因业已提上发掘工作的日程,各地区的考古发掘水平因此都有较大提高,资料的科学性不断增强,考古学的中国特色逐步形成。

值得回味的是,苏秉琦先生在1979年提出考

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之后明确提出了层位学的概念,前者在宏观方面勾画出中国考古学文化大格局的蓝图,后者是走向理想境界的具体方法,所以,地层学向层位学的转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大势所趋。

## 二 长于描述向深度研究的转变

这是推进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环节。考古学介绍和描述资料只是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任务之一。如果认识仅仅停留在肤浅的、具体的、表象的层面,那么,考古学存在的意义无疑将受到质疑。当然,描述现象也必须经过研究,但无论怎样其科研含量毕竟有限,所以,对相关学科知识的掌握、对人类规律性行为意义的理解、逻辑和推理的能力、理论思维 and 创新的勇气就成为决定科学研究水准的关键所在。可是,至少到目前,热衷于简单地描述考古学资料与现象的研究不仅有之,数量还相当可观,所以,要大力提倡和促进考古学研究理念的转变。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在逻辑方面从简单描述向发掘资料内涵转变有很多例证。但是,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当首推张忠培先生关于元君庙仰韶墓地的研究。1958年发掘的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sup>[7]</sup>,有半坡人墓葬51座,其中,空墓7座,单人墓16座,合葬墓28座,全部的资料都收录在《元君庙仰韶墓地》中。该报告在形式逻辑和推理逻辑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熟练地运用考古类型学,正确地揭示出元君庙墓地半坡文化典型器物的变化特点和年代分期的标准;在推理逻辑方面则充分吸收民族学研究的成果与经验,第一次提出早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中国古代就曾经有家族组织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正确说明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基本组织的特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它成为实事求是研究中国古代墓葬和墓地的经典之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国范围的基本建设迅速发展,各地区大量不同时代的古代墓葬和墓地被发现和发掘,研究墓地分期与布局的热潮此起彼伏。元君庙仰韶墓地的研究经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对于墓地的分期、分群,墓列和墓组的划分成为研究的时尚,可是,仍没有任何研究能够与之相比肩。相反,有些研究机械地理解分析和排比的过程,使研究流于简单的套路;对材料的分析注重形式,而忽略其成因的探讨,于是,重蹈单纯描述的覆辙就难免发生了。所以,从长于描述向尝试深度研究的转变是要学习元君庙仰韶墓地研究的精髓,而非皮毛。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许多研

究方法具有相似性和共同性。运用类型学的概念对材料进行分类、描述和排序的研究从来就不是考古学的专利,而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可是,研究从资料的形式逻辑走进社会的逻辑,认识就不能停留在具体、表层和感性的阶段,辩证逻辑和推理逻辑必须大显身手。它们的力量和引导作用往往具有积极的建设性和必然性,是衡量历史深度研究的重要指标。根据人类行为连续性的经验观察资料、分析现象、提出问题,并以此作为判断和衡量认识的标准,在考古学研究中习见,这里姑且称为社会逻辑比较法。在向历史深度研究的挺进中,此法通常能够弥补类型学的不足,在逻辑和推理的力量推进下使认识进入历史的深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墓地研究能够很好地说明其意义。一般来说,考古学对墓地的研究都是从年代的分析入手,遗址或文化的分期必不可少,因为要了解堆积的过程与顺序,要明确同时期墓葬的数量;墓葬群落的划分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关乎墓地结构的认识。但是,在由相同文化性质的墓葬组成的墓地中,年代分期越细致、阶段划分得越多,则每阶段墓地平面中墓葬的数量就越少,其整体性也就因此遭到肢解。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参照人类对墓地规划经验的连续性特点,进行常理比对研究,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是薛家岗文化赖以命名的重要地点<sup>[8]</sup>,这里发掘出150座墓葬,均属于薛家岗文化,最有特点的器物是多孔石刀,分别有13、11、9、7、5、3和1孔,石刀的孔数都是奇数。如果按该遗址报告者关于墓葬分期的认识考察墓葬的布局,自然会对整个墓地产生支离破碎的感觉。若暂且将年代的问题搁置,按报告提供的资料,将器物回归到墓葬中,将墓葬再回到墓地的平面图中,就不难发现两种情况:一是石刀孔数的多寡与陶器的多少成正比,石刀孔数越多则陶器的数量就越多,因此,石刀孔数的多少具有指示社会地位的意义,按笔者的理解是军功的意义。二是整个墓地分为ABCDE5个墓群,其区域相当清楚。西北面的E群墓葬相对集中,数量多,排列整齐。由北而南的墓区在石刀的孔数方面呈现出递减的倾向。E群的M44是13、11孔石刀组合,为最高级;往南的D群中只有M47出9孔石刀,M37、49只出5孔石刀;再南的C群中只有M68出3孔石刀。显然,石刀孔数的多寡与墓区的排列顺序构成特殊的关系,足以表示不同的墓区存在着等级的区别。

有了这些认识,再观察墓葬的年代,可以进一步明确这里的墓葬群落形成的时间较长,但真正

具有规模则是在墓地较晚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该遗址E群墓葬在第五期时已经形成和表现出中心明确、左右对称的特点。出土13和11孔石刀组合的M44级别最高,位置居中;两侧分别是M58、M40。M58出9、5、3、1孔石刀各1件,M40出两件9孔石刀,都是9孔的级别;然后是外围的M54、14。M54出7、5、3、1孔石刀各1件,M14出1件7孔石刀。反映的石刀孔数递减其层级依次降低。属于遗址第四期的E群M15出有两件11孔石刀,说明该墓葬群落的地位具有较长的传统。这些现象表明:第一,这里的墓葬是依军功的等级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安置的,等级高者居中,以北为尊贵的墓群位置是遗址几个发展阶段的共同特征。第二,当时的人们对墓地的安排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规划意识,而左右对称的特点反映了墓地中的排次规则已经初步形成。不过,似乎那时只有特殊地位的家族才能享受此种权利或待遇。第三,石刀孔数的多少反映军功爵位的高低,表面看与辈分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在中国古代,家族的领导者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在军功爵位方面也必然当仁不让,所以,有理由推测家族领导者的军功级别当高于他的子女和其他亲属。如是,则潜山薛家岗M44的死者不仅身份高于M40和M58,其辈分亦然。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的昭穆制度要求,宗庙或墓地中的辈次排列,是以始祖居中,二、四、六世,位于始祖左方,称昭;三、五、七世位于右方,称穆。在明清两朝的皇家庙宇——北京的历代帝王庙中,还依然可以见到按照昭穆制度精神供奉历代帝王及功臣名将<sup>[9]</sup>。由此可见,潜山薛家岗墓地反映的现象如果不是昭穆制度的雏形,也定然蕴涵有昭穆制度的思想。第四,墓地中的规划的思想与意识,说明军功爵位及其相关的等级制度在社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已达到相当严密的程度,是当时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建设的实际内容,是历史深层的问题。

实践表明,从长于描述向深度研究的转变中,要注重发现材料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性,充分利用人类社会的经验知识揭示纷纭复杂现象的实际意义。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长江等流域,经考古发掘认识的遗址有多种类型,其中一类是村落,房址、柱洞、窖穴、陶窑、墓葬等遗迹现象一应俱全,还有一类则遗迹种类单一,很难以村落概括之。例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sup>[10]</sup>,其主要特点集中表现在遗迹的构成上:缺乏居住址,以灰坑为主体结构。与同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其他古代遗址存有较大的差别。过去,多数意见认为这里的灰坑或是窖穴、或是垃圾坑,因为见诸报道的该遗址第一次发

掘资料中有80余个埋有粮食或草籽,现存的粮食堆积厚约0.3~2米,报告者因此判定这些坑是贮藏粮食的窖穴。但这类坑中常出有猪、狗的骨架,其中,H12、H14、H265的猪骨架均出于粮食堆积的底部,H5粮食堆积底部有两具猪骨架,不论是把活猪还是死猪置于粮食底部,显然都没有考虑猪肉腐烂的因素,如果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贮藏食物显然与人类的经验背道而驰,完全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即使坑底堆放的是零乱的猪骨,仍然不能作为贮藏理解,而只能具有特殊意义,如此,坑内的粮食也必然与特殊意义相关。这类灰坑上部是灰土,内含大量的陶片等,有的与粮食之间隔有一层黄色硬土。当粮食腐烂下沉后,便与黄硬土形成空隙,足以说明黄硬土不是自然形成的堆积,而是放入粮食后有意填入的,甚至经过踩踏或夯打一类的处理。很明显,贮藏粮食是不需要经过这种特殊处理的。值得重视的是,这里的灰坑尚能作级别与层次的划分,坑中埋有粮食或草籽、猪、狗和成组器物三项内容俱全者级别最高,内容依次递减则层级渐低,由此推知,其他的将近300个灰坑当存有层级的差别,可以反映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在内容和级别方面的区别。由此可见,磁山灰坑的窖穴说和垃圾坑说就显得毫无根据了。

磁山遗址几次发掘都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陶盂、陶支脚等构成的“组合物”,约140处。这类出土点均发现在第二期遗存中。距离现在地表的深度虽不相同,但基本在一个平面上。各出土点组合物的数量、位置和组合情况不完全一致,主要由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陶盂、陶支脚、陶三足器等组成。有圈足罐的组合中不见陶盂和支脚,有的组合中有小口长颈罐、深腹罐等。石磨盘大部分是平放的,磨棒竖立,一头插入土中。陶盂、支脚多分散放置,有的将支脚放于盂内,其他石、陶器均在磨盘附近。组合物出土点附近有陶片、兽骨和烧土等,有的遗物则很少。这样的出土点比较集中,多者十几组,少者三、五组,很少有单组的,最密集的如T110在18平方米内就有10组。如果根据人类行为的经验加以判断,组合物必是一种祭祀的语言,再现出当时祭祀奉献的场景。以物代言来表达思想和意图的方式,不论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外国都曾存在。《左传·桓公六年》关于“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的记载,讲的就是祭祀语言及表达的内容。

根据磁山的遗迹环境和构成特点,特别是遗迹本身的现象,可以使人们联想到《尔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的记载,《周礼》中关于燔柴焚烧使烟气上升,以祭昊天上帝,用牲在柴上焚烧使烟气上升,以祭日月星辰,用牲埋于地下以祭山林川泽的描述,将文献关于礼制的记载推至到更为久远的年代。磁山遗址经历了几百年的岁月。人们定期在这里举行祭天礼地的仪式,显示出这种活动的制度化和规范性,以及组织严密、经久不衰的特点。磁山灰坑中大量的炭化农作物或草籽,曾令人叹为观止,如此之多的食物都用于祭祀活动无论如何也令当今的人们难以理解。因为现在的人们无法估计和想象在遥远的古代,虔诚的信仰与无限的崇拜曾经创造出多少奇迹,也不知道磁山遗址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意识和思维成长的水平及所达到的高度。然而,尽管缺乏那个时代文字的记载,但是这种现象符合人类社会逻辑的结论,其必然如此,否则,仰韶和龙山时代、乃至商周时期的同类活动又从何而来?

由此可见,逻辑推理的力量对于改变中国考古学在早期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而新的认识无疑又更加丰富了第三种转变的具体内容。

### 三 从补经证史向谱写历史篇章的转变

这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最显著特征。从20世纪20年代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到80年代,中国考古学正处于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期,资料的发现数量有限,研究的内容侧重于介绍,学科的任务主要集中在解决什么是考古学文化的问题,为什么是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运用考古学资料描述历史的研究成为主流倾向。可是,当考古学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就不满足于简单的描述,“为什么”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研究的视角也开始转向了历史的深度,考古学书写历史的特殊能力因而也就能充分得以展示出来。改变初登历史舞台之时其作用仅仅局限在补经证史方面的局面。

1985年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发表<sup>[1]</sup>,揭开了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探索早期历史的帷幕。应该说,这是中国考古学首次将文明起源作为基本的课题和研究的主题,阐述系统的认识,而此前的一些零星、分散的相关研究,或者题目带有文明字样的文章还不足以反映考古学整体研究的倾向。夏鼐先生指出:“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文明各时代都有

变化,每时代各具有一定的特点,但仍维持中国文明的共同特点。”“解放三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可以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第一步是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并强调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尽管当年夏鼐先生对二里头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还持保留意见,但对于中国文明土生土长的特点和不同时代文明特征所表明的联系性的论述,对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的论述,对于文明起源研究要依靠考古学资料的论述,对于以殷墟文化为根基探索中国文明的源头的方法等都为后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另辟蹊径,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化、文明多样性的特点,极大地拓宽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从理论和方法上引导学术界跳出传统的窠臼,从材料出发、从中国古代的国情出发考虑研究的思路。此后,苏先生又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和“发展模式三类型”<sup>[12]</sup>,提出了大遗址与国家的出现、文明的起源研究的关系、礼器与文明的关系等重大课题,指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也存在阶段性和可以做分级研究的可能性,使中国历史深度的研究拥有了更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作支撑。以往,几乎所有的学者研究中国早期历史都是以文献的记载为出发点的,这当然是因为史学的传统在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乃至考古学研究也不得不依赖于文献的记忆与考证,考古学只能提供资料而不能提出自己的认识。

现在,中国早期历史的特点已经明确无误地摆在世人的面前,不论承认与否,有些基本的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中国的礼制存在着上中下游的区别,中国曾经有个漫长的古礼时代,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特色,文献记载的诸如用鼎制度、昭穆制度、盟誓制度、军功制度都萌生于古礼时代。当今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56个民族、13亿人口,考古学资料表明,在这块土地上大约在200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降的万年开始,人类走出山洞,实现定居,经营农业,组织生活,不断地创造出崭新的文化。此后,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这种文化的连续性和体系的完整性在世界古代史上独一无二,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本身就是独特的类型。中国古代的礼制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数千年以来不

仅左右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支配着各个领域的生产活动,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哲学等领域形成了中国式的知识体系。农耕社会万年历史,青铜制造精美绝伦,甲骨文文奥秘无穷,中医中药神秘神奇,印刷术火药影响深远,丝绸陶瓷联通世界。几乎中国古代所有的贡献与成绩都与中国文明起源的道路与特点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也都是在礼制精神的感召下,为推进礼制活动的持久、深入开展而形成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文明是伴随着礼制活动的发生而产生,并随其发展而进步的。礼制的进程就是文明的进程,礼制本身就是文明,是文明的旗帜,是文明的内涵,是文明的核心。探索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离开礼制空谈财富不均、阶级矛盾、王权确立,社会复杂等现象,就不能抓住文明机制的关键与根本,不可能真正达到“探源”的目标。因为礼制是在中国古代物质资料生产、精神生活与社会秩序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贫富不均、社会分层、矛盾激化、阶级对立诸社会现象实际上产生于这三种生产的实践活动,而礼制集中了三种生产的成果和经验,是名副其实的集大成者,是当时社会机制的核心。这个特征是中国独有的,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唯一性,国外根本不存在能够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特征的资料与经验,所以,外国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学习,但中国的问题必须用中国的材料来认识和回答,用哲学的观点讲,就是不能用事物的普遍性去说明其特殊性。言必称希腊,不可能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样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的特色。在世界上流行的各种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有些成果只是对某些地区某个时代的认识,有些只是推测或假说,有些则成为经典、广为流传。外国的不一定都是属于世界的。那么,装饰着世界头衔的认识或理论,中

国是否都应该借鉴?显然也需要实事求是。即或广为流传的经典,其在中国的应用也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上述认识表明,谱写中国早期历史的重任委实落在考古学的肩上。这一重大的转变足证中国考古学的觉醒和理论革命所达到的境界和思想高度,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必将为人类的知识体系提供更新鲜、更丰富、更充实的内容,中国早期的历史将更真实、丰满和客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 [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 [2]严文明:《从王湾看仰韶村》,载《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 [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文物出版社 1959 年。
- [5]卜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 年第 2 期。
- [6]苏秉琦:《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 [7]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 1983 年。
- [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 [9]许伟:《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记述》,《北京文博》2008 年第 3 期。
- [10]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 年第 3 期;卜工:《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 年第 11 期。
- [1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 [1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 Awakening and Theory Revolu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

### Some Thoughts on Archaeology to Mature

BU Go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f Guangdong,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75)

Abstract: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Chinese archeology to mature can be concluded as “three changes”: The first one exists in the process of simple geological stratigraphy changing into the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in the basic theory; The second in the examples of simple descriptions into depth study in the research field; The third in the facts of the subject function changing from “history supplement” to “history compilation”.

Key words: simple geological stratigraphy;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simple description; depth study ;